

人文与历史的漫游：关中外缘考察后记

邱楚媛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生

时维八月，序属季夏。关中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文化的想象之域，承载起这份想象的中心人物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张载夫子，以及明清时期的一批关中学人，如冯从吾、李二曲。一向嗜读关中学人的文字，字里行间有一种刚正浑厚之气，他们谈论义理中正平和，但也决不敷衍滑转。关中学人的事迹则尤为令人神往，张横渠在京师讲授《周易》，高坐虎皮交椅，颇有斯文在兹的豪情与担当，却因听闻程伊川讲《易》而撤下虎皮交椅，相与请学。这件轶事已过去千年，仅仅被少数专业邻域的书蠹获悉，然而关中的这份真诚、爽直却代代相承，在一望无垠的黄土地里扎根，在秦腔的韵律里悠扬，在皮影戏的诙谐里流转不息。

一、生活处处皆学问，书里书外皆田野

7月30日从成都北上西安，古城下着微濛的雨。报到及入住地点为陕师大后夏苑宾馆，听到这个名字便联想到遥远的上古三代，想起若干年前曾听闻在西安城里捡一片瓦，都有可能是唐宋真品，隋唐长安城的后夏门遗址果在此地。长安城的棋盘状格局，处处彰显了这座城市的开放与活力，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种族、不同职业的人们在此地都有一席之地，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到达了顶峰，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。旧日盛景虽然不可复刻，但那份历史想象必定会参与到当下的建构之中，成为过去与未来的接榫。而我对于斯文不绝的感慨，每每在目睹历史遗存时兴发得尤为真切。

研习营在课程设计上十分精心。首讲是王明珂老师对文本表征与田野情境的方法论剖析。非常欣赏王老师提出的“在文本中做田野”的概念，他以自己对古史传说及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为例，说明了要如何多点地考察材料，如何用逻辑串联起材料呈现的生活经验，以及如何进行由“化奇特为熟悉”到“视熟悉为奇特”的知识产生过程。透过这样的研究视角，历史研究的广度可以被不断延伸，“田野”不再是人类学研究者的“战场”，而是触碰真实历史、探索更加多维、立体的人文学视域的必经之地。在王明珂老师的启发下，我在随后接触到的新知、新景，都构成了某个宏大版图上的一块拼图，这个版图会以什么面貌呈现，我还不得而知，但“田野”一直在那里，无论是充满想象和情感寄托的文字，还是断垣残壁的历史遗存，都有“拼图”可以去挖掘。这段探索的旅程，因为“田野”而更加令人期待了。

二、中心抑或外缘？正统抑或边缘？

一直以来从事儒家哲学的学习与研究，习用的是冯友兰先生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，关注的人物和文献，往往具有“正统”的气质，小说、话本、戏剧以及诗文，是较少出现在我的关注视点中心的。研习营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王德威、田晓菲老师的文学研究，让我看到文学也可以很“哲学”。我们可以由关学、由关中士人搭建起对关学思想、关中文化的解读，但思想从来不是悬空的，思想酝酿与生发的土壤、与思想发生化学反应的社会文化，都应该作为思想研究的内核，这些更接地气的、更具有情绪感召力的内容，往往受到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关注。而在文学和历史的视域中，那些被赋予正统性地位的文献却时常不足为证，可以说，正统在这里成为了边缘。

我不排斥边缘，也从不认为某一种思考可以长久自居中心，中心和外缘始终是动态的，二者之间有差异，也有着彼此的融合与交互影响。因此，无论是中心还是外缘，正统还是边缘，只要在历史与思想的版图上有交集，那就不应该厚此薄彼。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，如何平衡，如何客观而审慎地完成有限的结论，是必须进一步思考、实践的课题。

三、人与物：观物抑或观人

丰富的田野考察是研习营的一大特色，从西安、周原、宝鸡到固原，跨越了两个省，观赏了不可胜数的青铜器。专业的考古学泰斗焦南峰老师提示我们，陵墓就是一座地下城市，透过陵墓去研究古代的城市规划与官阶制度，或许会获得比文献研究更准确可靠的信息。田晓菲老师则通过埋或烧这两种对物的处置方式，提示出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，在君王看来，臣子时常与物等同，士与器的身份时常是交叠的。因此，我们看待物的方式，折射出我们看待人的方式。

宋代是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一个高峰，邵雍则是宋代最会观物的士人，他在《伊川击壤集》中列举了各种以人观物、以物观物的经验，而这一传统应当肇始自庄子。视点的转移，带来的是思想的深化，新人文精神的跃动，便在人与物的互动之中徐徐展现。宋人喜好观物，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的意趣洒脱而令人神往；今人喜好观人，时事热点、八卦绯闻动辄引来万众瞩目，而那些有着岁月刻痕的器物，连同着那个令人悠然神往的时代，兀自在博物馆里，静静地诉说往昔。人文学就像这个老物件，联结着人与物、时间与空间，它或许不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，却必须存在以提供值得恒久存留的记忆。